

书系
清玩



② 上海書畫出版社



邹涛 著



雅室清赏 文房一杂二项



清玩
书系

邹涛 著

文房杂项
雅室清赏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雅室清赏：文房杂项 / 邹涛著. —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3

(清玩书系)

ISBN 978-7-5479-1197-6

I. ①雅… II. ①邹… III. ①文化用品—介绍—中国

IV. ①K87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8581号

雅室清赏——文房杂项

邹 涛 著

责任编辑 朱艳萍 杨少峰

审 读 曹瑞锋

责任校对 郭晓霞

封面设计 品悦文化

技术编辑 包赛明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上海书画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200050

网址 www.shshuhua.com

www.ewen.co

E-mail shcpbh@163.com

印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5.5

版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79-1197-6

定价 99.00元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谈邹涛的文玩研究

——兼谈该领域研究进程（代序）

西岛慎一（1）

邹涛从2009年1月开始在日本东京的书法杂志《书海》连载“中国书画篆刻漫笔”至今已八年有余，连载亦达六十期。得知他欲将漫笔的部分内容汇集成《书斋雅物——笔墨纸砚》与《雅室清赏——文房杂项》两书出版，作为文房爱好者，也是邹涛多年深交之友人，谨以此序文为祝。

文房至宝首属笔墨纸砚，邹涛对此领域的研究极深，比如墨一项，从介绍出土的历代墨、年号墨至近代名家墨，进而延伸至濡翰，堪为美谈。四宝之外，他对与之相关的各种文玩研究也广泛而深入。诸如水注、笔筒、砚屏、臂搁、墨床、笔床、笔格、书镇、印泥、印盒、香炉、茶道具、古琴、奇石等等，不止于浅显解说，文中运用大量历史文献及考古出土来考察沿革及用途，引人入胜。

（1）西岛慎一，日本二玄社原总编，著名书法文化研究家。

关于石印材、玺印，以其作为篆刻家的经验为基础进行了极为详细的记述。其中对新石巴林石的介绍，恐怕是迄今为止最详细的。

邹涛介绍文房四宝时与书画名家的相关论述颇为精彩，对邓石如、赵之谦的论述独到，而尤为精彩的是论及吴昌硕的各篇，内容丰富并提出了诸多问题。

前些年，日本公开了私人收藏的吴昌硕致其友人沈石友的尺牍 188 页，据此内容，邹涛发表了吴昌硕《西泠印社记》是否为沈石友代作的文章，而且从该尺牍判断出吴昌硕的诗文也有沈石友的代笔等事实。

这些问题的提出皆源于邹涛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因此，我认为他对古玩的研究绝非兴趣上的玩物丧志，而是以科学的态度讲解并升华之，实在可喜可贺。

余负责二玄社书画出版时，参与过《古名砚》（五册）的编撰。1974 年至 1976 年间，从中国流传到日本的大量古砚中选择了 347 方，按原大尺寸采用了正面彩色、背面和侧面黑白方式印刷，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这种综合性古砚图录在当时尚属首次。当时最令人伤脑筋的是如何断定古砚的年代。比如端砚，标明为宋坑、老坑水岩、大西洞、水归洞等等，这些都是材质的问题，与年代并无关联。当时日本对砚的研究水准颇有局限性。

《文物》杂志辟出“砚史资料”专栏连载古砚图版 24 期（1964—1965），由王冶秋编写，开篇有“刊登砚史资料说明”，之后每期介绍刊载两至四方古砚，合计刊约八十方。其中有关陶砚刊出有“虢州法造润金砚子”铭文的砚背，对虢州澄泥砚有了直观的认识。

王冶秋对古砚时代的断定是基于考古发掘，我当时预感到对于古砚的时代断定必将使用这种方法。此后，中国陆续出版了古砚的相关图录，《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砚》（1979 年，文物出版社），《紫石凝英·历代端砚艺术》（1991 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首都博物馆馆藏名砚》（1997 年，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中华古砚》（1998 年，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国古砚·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2012 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等皆为我书斋插架。其中的《中华古砚》为各地博物馆古砚集大成图录，所刊载砚的时代比对都明示了“尊重提供单位及撰稿人的意见”等编辑方针。这表明关于古砚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尚无令人信服的统一标准。比如，首都博物馆的纪昀旧藏绿石砚，在《首都博物馆馆藏名砚》和《中华古砚》中均有刊载，纪昀分别刻铭称“端溪绿石上品”并“审定宋砚”。该砚 1970 年为康生所藏，康生推翻纪昀鉴定，刻铭改

为“洮河绿石”。从印刷图版可见该砚的石质呈现出洮河绿石的特征，但康生并未阐明定其为洮河绿石的理由。将宋砚改定为明砚，或许是因其雕琢特征吧。

《中国古砚》是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华慈祥从馆内所藏数百方古砚中挑选出来的研究性图录，它将汉晋到宋代出土的大量古砚与传世砚相对照，以此界定时代，华慈祥提出了比王冶秋的研究更进一步的客观性评定方法。针对元明清的传世砚，也从材质、雕琢、砚铭等方面综合性判断时代。这与邹涛的古砚研究手法相近，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稳妥的研究。

台北林伯寿的《兰千山馆砚谱》为林熊光（朗庵）所编，林熊光在该砚谱序文中提到砚的“三美”，即砚石之美、雕琢之美、先贤铭刻之美——古砚鉴赏三要素。他主张古砚鉴赏应遵循这三要素。《西清砚谱》、纪晓岚《阅微草堂砚谱》、高西园《砚史》、沈石友《沈氏砚林》、邹适庐《广仓砚录》等都是对砚的“三美”为基准编辑的。林熊光列举这些先例进而说明自己于《兰千山馆砚谱》也基于此“三美”。

“三美”中的砚石之美和雕琢之美是所有砚台必须具有的，唯先贤铭刻之美却为绝大部分砚台所无。《兰千山馆砚谱》不选编无砚铭者，也可看出其审美意识之坚决。

无论华慈祥的方法论还是林熊光的鉴赏态度，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今后的古砚鉴赏和研究还有许多难以逾越的鸿沟。

对于印材的鉴赏进行系统性论述恐怕难于古砚，砚的“三美”基准并不完全适用于印材。印材本身的材质美容易成为鉴赏的标准，与宝石审美相近。若想避免这类矿物标本性质的鉴赏，仍需采用重视时代和人为因素的鉴赏方法。希望端溪的宋坑、老坑、大西洞等有材质特色的时代感判断法也可以运用到印材鉴赏上。

与砚、印材相比，笔、墨属于消耗品，对于鉴赏史来说实属遗憾。但是在书体的发展以及书风的展开上，笔、墨、纸却发挥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苏易简《文房四谱》独树一帜，将此文墨四宝整理归纳，做了系统性论述。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论》当为此方面最严谨的著作，曹昭对这些文房雅玩不拘泥于爱好，而是作为书画制作的用材进行整理，进而系统性论述。文房雅玩在此拥有了积极意义，将生活提升到涵养的世界中。

畏友邹涛研究中国古玩并开始著述已二十载有余，他不把笔、墨、纸、砚、印材以及其他文玩作为一个个独立存在看待，而是作为文墨世界、文玩爱好来综合性把握、研究之，因为他把这些文玩雅品与书画创作紧紧地结合到了一起。我从他这里感觉到

了与苏易简、曹昭同样的态度，拥有学术视点，并以学理的方法为基准。就砚而言，他是王冶秋砚史资料研究方法的忠实继承者。

与书画创作相关的文房雅玩，经邹涛重新整合，必将成为书画爱好者的必备文献。通过本书的发行，该领域的鉴赏将获得新的发展。期待它作为当今该领域的第一手资料而受到读者的欢迎。

目 录

谈邹涛的文玩研究——兼谈该领域研究进程（代序）	西岛慎一	1
文房四宝以外别有清玩		1
水注、水丞		4
笔洗、笔觚		15
砚 屏		24
笔 筒		30
臂 搁		42
墨床和笔床		50
笔格、笔架、笔山、笔插		58
镇 纸		67
印 石		75

印泥、印盒	91
香	97
香 炉	103
其他香具	119
茶和茶道具	127
文房其他必备杂件	149
古琴、琴台	159
奇石（文房供石）	166
古青铜器、玺印	175
陶瓷器	186
文房的书画悬挂与赏玩	198
古籍与碑帖	207
金铜造像	222
附 录 九松园提供藏品目录	232
后 记	237

文房四宝以外别有清玩

文房作为文人读书、雅玩清赏之室，是文房主人工作之余的心灵归所，或养心、或消散、或读古书、或待雅客，甚至品茗、辞赋、弄琴等等，属于主人在家里的“自留地”。房中陈设高雅考究如何，可考量出主人的传统文化素养和雅好。而房中陈设、收藏的一应物品，被称之为“文房雅玩”。雅玩的概念非常广泛，首先是文房四宝——笔墨纸砚。

从实际赏玩、收藏角度来说，砚确实是重中之重。其一，砚台承载的文化、艺术含量极重，大多佳砚（往往包括砚盒）选材考究、制作精良，部分历经名人藏弃，刻有铭识，书画艺术之外，别具艺术魅力，兼艺术、文化、工艺于一身。其二，砚台以端、歙等名石为主，历劫不磨，因而砚台能传之久远，正因为它的坚实，易于保存，传世量极大，也易于系统收藏，尽管有部分陶（含澄泥）、瓷等易碎砚台，终归占比极小。也正因为此，历代文人皆爱好佳砚。笔、墨作为实用消耗品，随用随减，随用随弃，因此传世、保存皆难于砚台。明以前的笔，多半属于工艺品类。实际传世毛笔情况看，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清代笔还有使用价值外，绝大多数笔毫或已损毁或遭虫蛀，仅留工艺品属性的笔杆。墨的命运略好于笔，明代程君房、方于鲁开制墨家《墨谱》之

先，清四家继之，墨谱的传世，弥补了墨作为消费品而被磨失的不足。历代藏墨家无数，更有不少成系统的收藏，也有不少专门研究的著述。不过，实用角度看，基本上局限于明清，而更早的墨多为出土品，不具有实用性。纸的属性非常特殊，纸与墨一样，都通过书画、印刷而转化为历史文献、历代书画作品，它承载着我国的历史、文化、艺术，是人类进步的象征——“四大发明”之一！因此，纸张的存世量极大，但它已经不是文房四宝中作为原材料的墨和纸了。作为材料属性，纸张极难传世。除了敦煌、西域出土的古纸外，很少能见到有未曾使用过的古纸。通常能见到明代、清代的旧纸已经不错了。因此，纸张本身少见有专门的收藏。宋代苏易简在《文房四谱》中就特别强调说：“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取索。可终身与俱者，唯砚而已”。古人有评：“论文房四宝者，必云笔纸墨砚……惟笔不能耐久，所谓老不中书，纸置久则酥脆，难于使用，墨陈失去胶性，而易于散碎，均难久蓄。惟砚性质坚固，传万世而不朽，历劫而如常，故砚之为留千古而永存者。”笔者撰写了《书斋雅玩——笔墨纸砚》一册，与本册为姊妹篇。

文徵明曾孙文震亨（1585—1645）在《长物志》一书中列出了众多的“四宝”以外的文房用具，其中有：水中丞、水注、笔格、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舔、糊斗、蜡斗、镇纸、压尺、秘阁、贝光、裁刀、剪刀、书灯、印章、香炉、袖炉、手炉、香筒、如意、钟磬、数珠、扇坠、镜、钩、钵、琴、灵璧石、昆山石、太湖石、粉本、宋刻丝、画匣、书桌、屏、架、几、沉香、茶炉、茶盏等。这可看出明时文人的雅玩与闲情。

四宝之外，有品类众多的相关衍生品，比如，与砚台相关的水注、水丞、砚屏等；与笔有关的笔筒、笔搁、笔洗、笔舔等；与墨相关的墨床等；与纸相关的镇纸、压尺、裁刀等等。还有四宝之外的文房摆件，品茗、抚琴、焚香道具，文人藏书乃至书画阁帖。凡此等等，才构成完整的“文房”。

笔者曾据此撰文描绘理想中的文房：清静优雅的一室之内，布置有紫檀、黄花梨书桌，桌上摆有佳砚，砚旁明代翡翠或和田白玉墨床上放着明清佳墨。汉铜鎏金文镇（席镇）、宋元明清白玉、墨玉神兽镇压着明清笺纸，白玉笔架、乾隆掐丝珐琅缠枝花卉笔山上搁着乾隆斑竹管紫毫笔，案头朱三松、吴之璠、周芝岩等名手刻竹笔筒插着大小湘妃竹管佳笔，边上配以宋汝窑或乾隆仿汝窑、官窑笔洗，紫檀博古架上供有先秦钟鼎彝器；宣德炉中燃着越南奇楠香；墙边紫檀书架，黄花梨多宝阁，陈列唐宋拓本，

明代轴台上盛着宋元书画名品，或者文徵明、徐渭、董其昌、王铎、八大山人书画手卷、册页，窗前花台上的元明花盆养有“素心”兰花一丛，墙角配以灵璧石、太湖石、英石摆件，窗外修竹数丛，随风摇曳，或隐或显。主人端坐其中，品佳茗、读古书、赏名画，眉批、题跋，与先贤对话，其乐无穷。虽说，这种文房雅玩，是文人的无限向往，但却是中国传统文人们雅玩的“中国梦”。在漫长的人生中，若能不断地点滴积累，实现之是大有可为的。

其实，近些年国内外相关拍卖会上，都少不了各种文房雅玩，不少博物馆级的珍品也在拍卖中，为艺术家、文人们，提供了收集历代文房珍品的难得机会。当然，这首先需要有足够的知识和眼力以及真心喜爱作为保障。

文房雅玩品种繁多且量大，容笔者细细道来。

水注、水丞

文房用具中“笔、墨、纸、砚”四宝是核心部分。四宝以外，还有围绕四宝的运用，以及书画创作相关联的种种文房雅玩，比如与笔有关的“笔架”“笔筒”“笔洗”“笔舔”“笔匣”“笔格”“笔挂”，与墨有关的“墨床”“墨匣”“墨盒”，与纸有关的“纸筒”“镇纸”“纸刀”，与砚有关的“砚屏”“砚滴（水注、水丞）”“砚山”“砚匣”，与书写有关的“臂搁”“毡垫”，与落款有关的“印石”“印泥”，与临帖有关的“帖架”，与画画有关的“调色盘”，还有文人喜好的香炉、香薰，文房摆件如雅石（太湖石、灵璧石、英石）、山子、如意、花插等等，文房硬件，还有书案、书橱、书架、座椅、茶几、花台、百宝格等等。

先介绍研墨用盛水器。

研墨所用的盛水器属于“注水具”类，有“水注”与“水丞”等等之分，通称“砚滴”，有别于洗涤毛笔的“笔洗”。这样的局限，区别了一些器具，但范围依旧非常广，名称尚无统一标准，现以通常称谓行文。

《释名》曰：“砚，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1〕}也就是说，使用砚台把墨锭研磨

〔1〕见《文房四谱》，中华书局2011年版，P135。



图一 故宫博物院藏汉铜驼形水注

成墨汁。自古以来，一直到近代“墨汁”面世为止，墨是以“墨块”“墨锭”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在研墨时都需要水，也就需要盛水的容器，这种容器，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逐渐定型，成为文房雅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盛水器最早出现于何时，尚不能确断，但应当不晚于秦汉。从历史记载以及出土文物看，汉代已经有了这类的器物。^{〔图一〕}《西京杂记》卷六〔汉刘歆（约前50—23），一说葛洪（284—364）〕记载：“晋灵公冢甚瑰壮。四角皆以石为獬豸，捧烛石人男女四十余皆立侍。棺器无复形兆。尸犹不坏。孔窍中皆有金玉。其余器物皆朽烂不可别。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润如新。王取以盛书滴。”这个记载中所谈及的，就是汉代的玉质蟾蜍水滴。宋赵希鹄在《洞天清录集·水滴辨》中称：“今所见铜犀牛、天禄、蟾蜍之属，（行外缶内）衔小孟者，皆古人以之贮油点灯。今误以为水滴耳，正堪作几案玩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汉—六朝铜蟾蜍砚滴”，虽不能明确具体的时代，但可能到汉代，也是比较早期的盛水器。

一般来说，有把有嘴的壶形盛水器，称之为“水注”，通称“水滴”等。宋周必大（1126—1204）《玉堂杂记》卷下：“御前列金器，如砚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滴之属，几二百两。既书除目，随以赐之。隆兴初（1163—1164）犹用此例，乾道（1165—1173）以后，止设常笔砚而已。”宋赵希鹄《洞天清录集·水滴辨》云：“余尝见长沙

故官家有小铜器，形如桶，可容一合，号右军研水盂，其底内有永和字，此必晋人贮水以添砚池者也。古人无水滴，晨起则磨墨汁盈砚池，以供一日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元明人陶宗仪（1321—约1412）《辍耕录》（卷十九·神人狮子）载：“松江之横云山，古冢累累然，世传以为多晋陆氏所藏。山人封生业盗冢。至正甲辰春，发一冢，冢砖上有‘太元二年造’五字。按：太元，东晋武帝时也。逆数而上，计九百一十余年矣。或者谓冢有志石，恐事泄，秘弗示人。冢中得古铜盂、勺、壶、洗、尊、鼎、杂器物二百余件。内一水滴，作狮子昂首轩尾走跃状。……诚奇物也。”从实际传世藏品看，水滴式样非常多，有动物形、鱼介形、花型、壶形以及仿古代青铜器形等等，个别的也有茶壶酒器等转用者。

敞口的，以小勺或匙汲水的砚滴容器，称为“水丞”，宋时称为“水中丞”，泛称“水盂”。这类的小水丞，在历史上出现很早，至少在王羲之生活的那个年代，已经非常盛行了。北京故宫藏有汉代的鎏金青铜“水丞”，晋越窑水丞（图二），则是目前公认较早的“水丞”器。宋代水丞非常流行，其中有的小型敞口可盛水的青铜器、瓷器等等，也被转为“水丞”之用。

水注、水丞都是文人书桌上必备的研墨用具，形式多样，材质广泛。常见的有：青铜器、陶瓷、玉器、竹木牙雕、料器（玻璃制品）等等，细分的话，陶瓷类，几



图二 西晋越窑水丞

乎各个时期，各个窑口都有烧制。宋以前，越窑青瓷多见（图三、图四），古陶器、原始瓷、唐三彩（图五）、磁州窑系、长沙窑（图六）的也有传世，宋代定窑、汝窑、钧窑、官窑、哥窑、耀州窑、龙泉窑（图七）、湖田窑（图八）等，元以后，青花、粉彩、各类单色釉（图九）都有，明代、清代，特别是“康、雍、乾”三代更是乐此不疲，创制了不少瓷器精品。青花（图十）之外，还有雍正粉彩、乾隆仿石墨彩珐琅彩（图十一）等等。玉器类，无论是白玉、青玉（图十二）、碧玉、黄玉以及玛瑙（图十三）、水晶都有实例，由于玉类制作难度较大，非皇家、



图三 唐越窑青瓷水注



图四 唐至五代间越窑青瓷水注



图五 唐三彩水注、水丞（附象牙盖）

图六 唐黄釉水注 图七 宋龙泉窑水丞